

从“社会派”到“写实本格”

——东野圭吾推理小说风格的流变与日本社会转型

申冬梅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东野圭吾是日本当代推理小说中最具转型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生涯与日本社会从泡沫经济巅峰到“失去的三十年”的漫长转型恰好重合，形成了一条从模仿本格到转向社会派、再到确立“写实本格”的清晰路径。本文以叙事伦理为核心框架，考察了东野圭吾风格演变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次风格蜕变，都不是单纯的美学选择，而是对特定社会危机的文学回应。前期本格推理对应的是泡沫经济时代的乐观主义与解谜趣味，中期社会派转向折射出泡沫破裂后个体的生存焦虑，后期“写实本格”的确立，则意味着推理小说完成了从解谜娱乐到社会批判的范式转换。东野圭吾的“写实本格”不是本格和社会派的简单嫁接，而是一种以创伤叙事为内核、以动机追问为驱力的辩证综合，它把推理小说的形式创新和日本社会转型期的伦理困境熔铸在了一起。

【关键词】写实本格派；叙事伦理；日本社会转型

【收稿日期】2026 年 8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9 月 3 日

【DOI】10.12208/j.sdr.20260070

From the “Social School” to “Realistic Honkaku”:

The evolution of Keigo Higashino’s mystery fiction style and Japan’s social transformation

Dongmei Shen

Guangzhou Cit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Keigo Higashino is one of the most transformation-conscious contemporary Japanese mystery writers. His literary career coincides with Japan’s protracted transition from the zenith of the bubble economy to the so-called “Lost Thirty Years,” tracing a clear trajectory that moves from imitative *Honkaku* to a turn toward the Social School, and final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Realistic *Honkaku*.” Adopting narrative ethics as its cor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ashino’s stylistic 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Each of his stylistic metamorphoses is not merely an aesthetic choice, but rather a literary response to specific social crises. The early *Honkaku* phase corresponds to the optimism and puzzle-centered entertainment of the bubble economy era; the mid-career shift toward the Social School reflects the existential anxieties of individual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ubble’s collapse; and the later consolidation of “Realistic *Honkaku*” signifies a paradigm shift in mystery fiction from puzzle-solving diversion to social critique. Higashino’s “Realistic *Honkaku*” is not a simple grafting of *Honkaku* onto the Social School, but a dialectical synthesis that takes trauma narrative as its core and motive-driven inquiry as its driving force—a synthesis that fuses formal innovation in mystery fiction with the ethical dilemmas confronting Japanese society during its period of transition.

【Keywords】Realistic *Honkaku* school; Narrative ethics; Japan’s social transformation

引言

东野圭吾是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的标志性人物。1985 年，他以《放学后》拿下江户川乱步奖正式出

道。此后近四十年里，他出版了六十多部小说，多部被改编成影视剧，不只在日本本土大受欢迎，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亦有大量读者。2006 年，《嫌疑人 X

的献身》同时拿下了直木奖、本格推理小说大奖，还登上了日本三大推理排行榜的第一名，这在推理小说界是前所未有的。

学界通常把东野圭吾的创作分成三个阶段：前期（1985—1990），主要是模仿和继承本格推理，重解谜而轻写实；中期（1990—1996），开始关注社会和人性的，属于风格转型的过渡期；后期（1997年至今），把本格推理的严密逻辑和社会派的深度写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写实本格派”风格。既有研究常常把东野圭吾的风格演变归因于市场驱动^[1]，本文试图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引入叙事伦理的视角，会发现东野圭吾的创作转型本质上是一次从“谁是凶手”到“为何犯罪”的伦理转向。这种转向和日本社会从经济至上到生存焦虑的集体心理变迁之间，有一种结构性的共振。

1 本格的起点

1.1 本格推理的传统与东野的继承

“本格派”是日本推理小说最初的形式。在日语里，“本格”的意思是正统和纯粹，“本格推理”以解谜游戏为中心，强调逻辑和证据，力求拨开迷雾找到真相。这条线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为以岛田庄司为代表的“新本格派”，特点是诡计华丽、设定新奇。1985年，东野圭吾靠《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跨进了职业作家的门槛。他早期的作品以校园推理为主，像《学生街的杀人》《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之类，风格清新流畅，但技法上可以概括为三个词：强调反转、倚重诡计、文笔还比较稚嫩。

不过，东野从一开始就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本格推理的局限。他读高中时偶然接触到小峰元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从此迷上了推理小说，之后又读了松本清张的一系列作品。松本清张的“社会派”传统，即把推理和社会现实批判结合起来的写法在东野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本格派的智性趣味和社会派的现实关怀，这两股力量构成了东野后来创作的内在张力。东野对逻辑严密性的执着，以及他对“人性实验”式叙事的偏爱，和他理科出身、受过科学思维训练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2]。

1.2 泡沫经济时代的文学镜像

出道后的十年里，东野圭吾虽然顶着职业作家的头衔，但作品销量一直不温不火。与此同时，“新本格”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绫辻行人等一批新人

作家靠着华丽的诡计迅速蹿红。这段时间恰好是日本社会从泡沫经济鼎盛滑向崩溃的剧变期。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冲到了顶点，整个国家沉浸在平成景气的狂欢里。然后到了90年代初，泡沫突然破裂，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开始侵蚀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

东野圭吾早期的本格创作之所以没能获得广泛认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单纯的解谜游戏已经很难回应读者在泡沫破裂之后对现实的焦虑。当一个社会从经济增长的集体叙事中猛地跌落，读者对文学的期待自然就从智力娱乐转向了情感慰藉和现实解释。

2 转向的契机

2.1 从“诡计”到“动机”的转向

1990年出版的《宿命》，被学界公认为东野圭吾创作生涯中最关键的转折点。这部作品承上启下，前期那种对反转和诡计的偏好还在，但中期对题材和文笔的深化也已经浮现。东野自己说过，“犯人制造了怎样华丽精彩的诡计，这样的谜团设定固然不错，但我更希望创作出其他类型的意外性”^[3]。从《宿命》开始，他把创作重心从制造华丽的诡计，转向了探索人性层面的意外、社会关系层面的意外。

《宿命》的创作时间（1990年）正好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初期。社会剧烈变动，人们对安全感的需求空前强烈，金钱开始凌驾于亲情、友情、爱情之上，人性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东野圭吾在《宿命》里开始尝试把个人命运和社会体制的冲突放进叙事里。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派的回归，而是一种叙事伦理意识的萌芽，犯罪不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谜题，而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社会现象。

2.2 动机追问的极致化

1996年出版的《恶意》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凶手很早落网，对罪行供认不讳，但小说的悬念完全不在于“谁是凶手”，而在于“为什么要杀人”。这种对犯罪动机的极端追问，显然是松本清张社会派传统的延续。不过，东野圭吾和松本清张的路径不同，松本清张追问的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动机，东野圭吾则更侧重微观心理层面。东野作为新社会派的代表，他的作品更关注人们切身相关的社会问题，这和松本清张重视官商勾结、民族矛盾等宏大命题的取向，形成了明显的代际差异。

《恶意》采用了手记体叙事，让凶手用手记构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叙事骗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被一步步引导，相信了凶手的虚假叙述，直到真相一层层剥开，才发现从一开始就被带进了沟里。这种叙事策略不只是制造了阅读上的意外感，更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东西，恶意并不需要什么合理的动机，它是一种根植于人性深处的、非理性的黑暗力量^[4]。东野圭吾用这个结构暗示了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社会的一个现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脆弱到了连动机都不再可靠的程度。

3 “写实本格”的确立

3.1 情感真实与形式解放

1998年出版的《秘密》是东野圭吾创作历程中的又一个转折点。整本书没有命案，没有谜团，也没有警察和侦探，却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小说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平介的故事，妻子和女儿遭遇车祸之后，妻子的灵魂进入了女儿的身体。平介面对一个伦理困境，他不知道自己该以丈夫的身份还是父亲的身份和这个合体人相处，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了对妻子和女儿的双重控制欲，痛苦不堪。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平介的年龄（39岁）和写作时的东野（40岁）非常接近，而一年前东野刚刚与妻子离婚。可以说，《秘密》写的是东野自己的真实感受，关于爱情、婚姻和失去的切身体验。《秘密》的突破在于，它确立了情感真实这条叙事原则，推理小说的核心驱动力不必是智力游戏，可以是人类情感的真实表达。这种对情感真实的追求，正是“写实本格派”的核心精神，推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解谜游戏，而是嵌入生活、指向人心的叙事方式^[5]。

3.2 泡沫经济的空间寓言

1999年出版的《白夜行》意味着东野“写实本格派”风格的全面成熟。小说以1973年到1992年间日本社会的真实变迁为背景，时间跨度长达十九年，把泡沫经济的膨胀和破灭织进了故事里。小说一开篇，场景就是大阪一座废弃的烂尾楼——这恰好是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社会衰败景象的象征。从空间叙事学的角度来读，《白夜行》里反复出现的废弃空间，如烂尾楼、地下通道、废弃工厂，不只是情节展开的物理场所，更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社会废墟化的空间隐喻。亮司和雪穗在这些空间里穿行、隐匿、犯罪，就像日本社会底层群体在经济废墟中挣扎求生的缩影。

雪穗和亮司爱情的悲剧，根源在于家庭冷漠和社会残酷导致的人性扭曲。雪穗过早地看到了社会的肮脏，承受了不该由她承受的痛苦。有学者指出，东野圭吾不是讨厌女性，恰恰是因为他关心这些弱势群体，才会写出这些作品^[6]。东野圭吾笔下的恶女形象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创伤叙事，她们的恶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结构性问题在个体身上留下的创伤后反应。这种写法让东野圭吾超越了传统社会派的制度批判模式，进入了一个更深的追问：个体如何在结构性问题中寻找生存空间？

3.3 辩证综合的巅峰

2005年出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被公认为东野圭吾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把本格诡计和爱情主题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石神哲哉为了保护自己暗恋的女子而杀人，用他完美的数学逻辑构造了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谜题。书里既有本格派严密的推理逻辑，又有社会派对人性的深刻探讨。这部作品让东野圭吾史无前例地横扫了日本推理小说三大排行榜，还拿下了直木奖。

从创作理念上看，《嫌疑人X的献身》证明了东野圭吾多年的探索方向是对的，本格和非本格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部作品代表了“写实本格”的辩证综合形态，本格推理的诡计设计不是孤立的智力游戏，而是人物生存状态的直接延伸。石神用数学逻辑构建诡计，恰恰是因为数学是他唯一能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他作为社会边缘人最后的尊严所在。诡计本身就是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表达，形式和内容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统一。这种形式即内容的叙事策略，是东野圭吾对推理小说形式美学的重要贡献，也是写实本格区别于传统本格和社会派的本质特征。

4 风格流变的社会逻辑与理论反思

4.1 推理小说与日本社会的共振机制

东野圭吾风格流变背后最深刻的逻辑，是推理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始终和它所处的社会语境保持着紧密的共振关系。“本格派”兴起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长期的乐观氛围中，解谜游戏象征着秩序是可以恢复的，每一次案件被侦破，都是对社会理性的一次确认。“社会派”盛行于战后经济复苏时期，松本清张把推理的视野从个人诡计拓展到了社会结构的不公，让推理小说获得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品格。“写实本格派”则是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

社会弥漫不安与幻灭感的背景下出现的，它追问的不再是“谁是凶手”，而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普通人会变成凶手”。

从这个角度看，东野圭吾的风格演变可以被视为日本社会从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三十年的文学映射。前期作品（泡沫经济鼎盛期）以轻松的校园推理为主，对应的是社会对智力娱乐的需求；中期（泡沫破灭后）开始关注社会焦虑和个体困境，回应的是读者对现实解释的渴望；后期（长期低迷期）则把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和对个体命运的同情熔铸为一，满足了社会对情感慰藉和伦理反思的双重需求。

4.2 恶女谱系与社会困境

东野圭吾笔下的恶女形象，尤其是《白夜行》的雪穗和《幻夜》的美冬，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这些女性角色往往长相出众却心狠手辣，但东野圭吾会在叙事中把她们的性格成因和每一步发展都交代清楚。她们之所以成为恶女，根源往往在于社会结构对女性的压迫^[7]。东野圭吾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改变了传统日本文学中妇女的柔弱面貌，展示了当代日本女性独立、自主、刚毅的一面。如果把东野圭吾的女性角色串起来看，从《白夜行》的雪穗到《幻夜》的美冬再到《圣女的救济》的绫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谱系，从受害者到复仇者再到自主行动者，女性角色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的获得，始终伴随着道德的沦丧，这恰恰暴露了东野圭吾对日本社会性别困境的深刻观察，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里，女性想要获得主体性，似乎只有通过“恶”的途径^[8]。这种悲剧性的叙事逻辑，是东野圭吾叙事伦理意识的又一体现。

4.3 从悬疑到社会批判的文学转型

东野圭吾的转型不只是个人创作风格的演进，也折射了整个推理文学在全球化、大众化时代的命运。1994年以后的日本推理文学，可以被视为一个与启蒙时代、本格时代、社会派时代和新本格时代比肩而立的新时代。东野圭吾把推理小说从解谜娱乐提升为探讨人性和社会问题的严肃文学，让推理小说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东野圭吾面对失去的三十年中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结构之恶，选择以人性而非制度为切入点，恰恰是对这种新型社会困境的

准确回应。

5 结语

东野圭吾的创作生涯，既是一部日本推理小说从“本格”到“社会派”再到“写实本格”的演变史，也是一部日本社会从泡沫经济到长期低迷的转型史。“写实本格派”的实质，是在本格和社会派之间找到了一条以推理为外壳、以人性探究为内核的创作路径。它的核心是以创伤叙事为驱动的动机追问，通过对犯罪动机的深度挖掘，揭示社会结构性问题在个体身上留下的创伤，并以此唤起读者对社会伦理问题的反思。东野圭吾的成功说明真正优秀的推理小说，可以同时满足读者对智性挑战和情感共鸣的双重期待。这种双重性，正是推理文学在当代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董萌,周阿根.东野圭吾推理艺术创作研究[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4):98-108.
- [2] 蒋米娜.从松本清张、东野圭吾作品看日本推理小说的特色[J].芒种,2016(12):83-86
- [3] 东野圭吾.《小说现代》访谈.讲谈社,1990,8.
- [4] 肖海艳.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特色探析[J].新西部,2017(28):117,96.
- [5] 程一骄.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现状考察[J].中国文艺家,2018(12):106.
- [6] 唐丹凤,杨俏村.浅析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魅力——以《白夜行》为中心[J].青年文学家,2016(29):127,129.
- [7] 刘帆.东野圭吾《白夜行》中恶女雪穗形象分析[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29(05):84-88.
- [8] 李晓红.东野圭吾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2):111-112.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